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近几个月来，中央报刊就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为了便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讨论，我们特将今年三月份以来中央报刊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选编出版。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

目 录

-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红旗》杂志评论员(1)
-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9)
-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
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周 扬(26)
- 排除干扰 乘胜前进.....冯文彬(48)
-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李洪林(61)
-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李洪林(70)
- 党的领导是实现四化的根本保证
.....《人民日报》社论(81)
- 搞好党风是党领导人民实现四化的根本条件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86)
- 思想要解放 理论要彻底.....郭罗基(95)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原则

《红旗》杂志评论员

中国正处在大变动中，到处热气腾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引着全国人民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奋勇前进。最近，党中央在响亮地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同时，重申了在思想政治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注意中国的特点。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现代化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也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搞的现代化，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坚持上述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最鲜明的政治标志。

列宁说过，“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我们党历来都是这样做的。建国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我国立国的根本方针，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林彪、“四人帮”十年来年

对四项原则的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大灾难。粉碎“四人帮”以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都坚持了这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取得很大的胜利。

为什么今天要突出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呢？这是因为某些人（哪怕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原则。一方面是党内有极少数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不从实际出发，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利于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极少数同志对这种思潮的危险重视不够，或者认为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危险。在党内外，这几种人虽然都是极少数，但是危害很大。如果不及时地坚决地同上述两种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作斗争，并且在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中彻底战胜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国家前进的根本方向，因而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逐步创造条件，迈向共产主义。这就是说，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革命理想，历史地规定我们只能走这一条道路，而决不能走别的道路。我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了一条不可动摇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现在有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议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别有用心。资本主义

发展了二三百年来，无非是一些国家在科学、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等方面比我们先进一些，劳动生产率和国民平均收入比我们高一些。但要知道我们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优胜得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在短短的三十年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前所没有的进步，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路程，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大大缩短了差距。如果不是遭受林彪、“四人帮”十来年的严重破坏，我们的经济情况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的，是为人民利益生产的，是不产生剥削的，它同以垄断为根本特征、单纯为超额利润而生产的帝国主义经济，是根本不相同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危机，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和堕落。而且，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具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前途。离开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具体情况，去赞赏资本主义的“美妙”，决然谈不上什么高明！我们深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得到了经验教训以后，今后的发展速度将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要快。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团结一切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以及国外侨胞向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专政，这就是我们这种新型国家的极大优越性。无产阶级专政“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对外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对内压迫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职

能。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国家的专政职能决不能削弱。“四化”中的一化——国防现代化，主要就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上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同他们的斗争虽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专政。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没有四个现代化。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对敌人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保障，而社会主义民主又是对敌人专政的力量源泉。现在有人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要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其实说穿了，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想要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要“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无非是想要资本主义制度。这难道是广大人民所能允许的吗？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保障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是我国劳动人民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法宝。

百余年来，我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受尽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我国人民为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

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党内的出现,是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中有其深刻根源的一种历史现象,而这种丑恶现象不是由任何别人,正是由中国共产党予以清除,因此,它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对于每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来说,不是由此而离开党和疏远党的领导,相反,正是更应当靠近党和接受党的领导。当然,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崭新的建设任务中,党的领导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甚至摆脱党的领导的理由。如果离开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我国的四个现代化?难道让那些自诩为“民主战士”的人来组织和领导吗?试问这些先生们能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呢?历史证明,不是别的什么民主党派而是中国共产党才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至于那些冒牌的“民主战士”们,那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记录可查的,难道他们在今天的后裔,又能搞出什么新鲜玩艺儿?目前还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党的领导颂扬群众的自发性,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是列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同“经济派”作斗争时就已经批驳过了的。对于我们说来,无论是发扬民主还是解放思想,都应该有利于党对“四化”建设的领导。林彪、“四人帮”煽动的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荒唐的恶剧,永远不能再让它重演了。

开创一个新中国,需要强大的精神武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同样需要强大的精神武器。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极其生动地描绘过我国先进的人们,为了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斗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但由于找不到强大的精神武器,他们仍然避免不了在黑暗中摸索

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我们的党不但坚信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并且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善于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密切地相结合。这就是举世公认的毛泽东思想。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国革命成功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了。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兴起来了。当然，这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也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们也吃了大苦头。但怎么能把这帮反革命分子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武器混为一谈呢？怎么能因我们自己不善于运用这个武器就容忍某些人来贬低、破坏这个武器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国人民曾经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人民同样将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获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胜利。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维系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维系着国家的统一，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四项内容，已经列入党章，载入宪法。它是实现“四化”的四大法宝，是我们国家和我国社会的四根擎天柱。“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四项基本原则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核心。只有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有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

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是依靠了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才使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就在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他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从而为世界反霸统一战线也就是为人类前途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是不容贬低的，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当然革命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因而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是在革命领袖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小的插曲，正如日月之食，无损于日月之明。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日月之明，人皆仰之。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仰赖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四化”建设不仅逼着人们去学经济工作、学科学技术，而且也逼着人们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前一种学习的紧迫感，人们已经普遍感觉到了；而对后一种学习的紧迫感，现在则为相当多的人所忽视。以为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就可以放弃学习革命理论，或者以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不行时、不吃香了，因而不需要学习它了，所有这些想法，无疑都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党内，如果没有更多的精通并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要想胜利完成新长征这样伟大的任务，那是不堪设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都要结合三大革命实践，有计划地认真地进行学习。我们要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我们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

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在今天，能否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着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抓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如果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抓住这个当前最大的政治，不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发想问题、办事情，那就是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大力宣传和坚持四项原则，战胜错误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压服的办法，而只能采取细致的说理的办法。现在对待那些对四项原则有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歪曲的人，我们主要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任务；只对极个别的“害群之马”和反革命分子，才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一切革命同志，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这四原则应当坚信不疑，决不能有丝毫动摇。爱社会主义祖国，爱无产阶级专政，爱中国共产党，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个公民的庄严职责。发扬这样一种“四爱”精神，必将鼓舞着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必将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党的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党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作的巨大工作，提出了从今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为了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来，直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林彪、“四人帮”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凶恶敌人。他们口头上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搞的是假社会主义；他们天天喊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也讲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派性，鼓吹无政府主义，以帮代党；他们表面上高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玷污和毁坏这面伟大旗帜。我们党进行的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

毫无疑问，也是一场捍卫和坚持四项原则的伟大斗争。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竭力推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在他们长期破坏下，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遗忘了，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分不清了，甚至公然被颠倒，出现了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局面。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去年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全会公报指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过去我们搞革命，靠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当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些阻力既来自尚未肃清的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也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来自官僚主义、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等等。因此，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当前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要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真研究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研

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把这些经验作为具体的生动的教材，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使他们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去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

历史的回顾

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它一直存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当中。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形成，还只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国际工人运动中，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运动：一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一种是少数人的宗派运动。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是阶级运动，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策略，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它派别，例如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它们的活动是宗派运动，而“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这种宗派运动不是以客观实际作为理论的根据，而是以人们头脑中编造的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指导运动。无论是蒲鲁东还是巴枯宁、拉萨尔，都以“救世主”自居，宣称他们“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正如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和这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宗派运动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尽管革命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宣告那些“万应灵丹”的破产，但是，这种思潮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就销声匿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就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展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在情况不同的国家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曾经在许多书信中，责备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正统思想”。责备他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看不见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作出了榜样，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地使他们的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得到丰富、补充、修正和发展。

到了列宁的时代，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更加尖锐的问题了。这不仅因为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各国有很大不同，而且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当时，机会主义者从“左”、右两方面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一方面坚决揭露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攻击和修正，一方面强调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忠于学说的字面”，“背诵过去的结论”，而应该“忠于学说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列宁全集》第6卷第117页）。列宁严厉地批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考茨基“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

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列宁正是在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俄国孟什维克的尖锐斗争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领导俄国人民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如果列宁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是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字句所束缚，那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衰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逝世后，斗争又集中地表现在究竟怎样才是真正地捍卫列宁的旗帜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借口维护列宁的旗帜，不管实践如何发展，宣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指示都不许有任何改变和补充，否则就是“修正主义”。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斯大林说：“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公式代替它们的都是修正主义。”“由此看来，我们有一个关于修正主义的新的季诺维也夫的标准，这个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必然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6、87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有时表现为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有时也表现为以片言只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前

一种形式是公开地打起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后一种形式则是在反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推行修正主义。

在我们中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在中国进行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经过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复斗争才取得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照搬，也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无论“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他们都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都看不到农民的力量。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指导革命的行动指南，而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攻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进行活动的同志是“背弃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清算这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需要长时间的斗争。我们党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算完成了对这条思想路线的清算任务。毛泽东同志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从认识论的高度批判了这条思想路线。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着重教育全党分清两条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保证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要战胜一切